

## 末次政太郎和末次研究所

### —末次研究所是否日本的情报机构？—

王雪萍（关西学院大学）

1996年，季啸风，沈友益主编厦门大学图书馆珍藏《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以下：《史料外编》）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末次情报资料的存在引来各界的关心。同时，人们对末次研究所的关心也相应提高。《史料外编》编辑整理说明中指出末次研究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在中国大陆设立的情报机构之一。位于北平（今北京）东城棲凤楼七号，由日本人末次政太郎开办的末次研究所，收集中国的有关情报资料制作的《日本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简称末次资料），其来源主要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〇年七月期间五十余种重要的中文，英文，日文报纸<sup>1</sup>。为此，许多国内媒体把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1912年就开始刺探我国军情，供日本侵华的情报参考之用的证据<sup>2</sup>。同时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厦门大学俄历史系研究生的何小敏的报告中指出“末次研究所属于与满铁调查课同样性质的情报部门”<sup>3</sup>，看来国人把末次研究所看作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机关的观点看似已为定论。

可是在国内外的各种刊物中对末次研究所负责人的末次政太郎的介绍可以说几近为零，而在编收了《史料外编》中西藏问题部分的2005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张羽新，张雙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彙编》第九册的出版说明中对末次研究所负责人日本人末次政太郎的说明也仅有“其生平尚待考证”七字。而报告人在接到厦门大学历史系连心豪教授的建议，开始着手进行对末次政太郎和末次研究所的调查以后，对中日两国的关于末次研究所的研究在各种书籍报刊上的先行研究进行了调查。可是令报告人吃惊的是，除了对于末次资料进行介绍的文章以外，对于末次研究所的先行研究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追其原因，可以说是因为资料极少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报告人也只在日本的外交史料馆和中国辽宁省档案馆发现了少许资

---

<sup>1</sup>季啸风，沈友益主编厦门大学图书馆珍藏《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3页。

<sup>2</sup>“尘封资料表明1912年日本就开始刺探我国军情”《扬子晚报》2000年9月19日。

“《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的庐山真面目”《纵横》2004年10期。

“历史见证：末次资料” <http://www.bbtpress.com/lm/zxwx/zhm/g/>

<sup>3</sup>何小敏“日本人看中国与中国人看日本—《末次情报资料》所透露日本队中国的关注点”

料。下面报告人就利用这些仅有的资料分析一下末次政太郎其人和末次研究所的性质。

末次资料倍受世人瞩目，可是关于末次政太郎其人生平的介绍却很少。末次政太郎其人到底是何许人，以何为生呢？而末次研究所有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研究机构呢？

日本外交史料馆保存的战前政治宣传关系杂件的支给宣传者其它宣传费支出关系的档案中保存着一份在支那日本公使馆公使芳泽谦吉发给伊集院外相的函件。这是大正 12 年（1923 年）10 月 23 日芳泽公使为生活在北京的末次政太郎向伊集院外相申请费用补贴的函件。据函件中谦吉公使介绍，末次政太郎是福冈人，已经居住在北京 10 年了。到目前为止都是靠担任福冈日日新闻的通信员的职务领取报酬，和每个月从安川家领取一些费用。因为末次近期内没有从其它途径取得收入的可能性，福冈日日新闻和安川家也希望外务省能够使用末次政太郎，给他一些经费援助。而末次希望能够从外务省得到的经费援助金额是每个月 300 日元左右。其后因为迟迟没有结果，末次还通过芳泽公使再次向外相询问，并希望能够先提前支取 1000 日元使用，结果末次政太郎得到了每个月 200 日元的经费援助<sup>4</sup>。

从以上史料中看出，末次政太郎在 1923 年时生活困窘继续金钱援助。而他的主要收入则来源于作为福冈每日新闻的通信员的报酬。而末次的财政出现问题则在大正 11 年（1922 年）的史料中便能看出。大正 11 年末次政太郎曾经委托九州制钢所的松本健次郎以财政部为担保向教育部短期借贷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支那教育部事业费一年，但此次借贷未被批准<sup>5</sup>。

从以上资料看来，在 1922 年至 1923 年期间，末次政太郎在北京的生活财政出现问题是毋庸置疑的了。而他在 1923 年以后虽然取得了外务省的资金援助，而外务省给予他的援助比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通桑田丰藏还少。从这点上看来，外务省并没有把末次政太郎作为谍报人员来使用<sup>6</sup>。

另外，外务省看待末次政太郎的身份时，到 1930 年还是以福冈日日新闻的通信员来看待的。这可以从昭和 6 年（1931 年）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矢野参事官发给外务省亚细亚局的函件

---

<sup>4</sup> 外交史料馆 1-3-1 “末次政太郎”。

<sup>5</sup> 外交史料馆 1-7-1 “对支借款关系杂件/北京政府部第二卷 3.教育部借款申出”。

<sup>6</sup> 外交史料馆 1-3-1 “末次政太郎”。

中看出来。该函件是关于在日本派发末次政太郎书写的以《应该关注的满洲在日本的地位》为题的小册子的问题。虽然小册子上面印刷着“北平 末次研究所”的字样，但在矢野的函件中，还是把小册子的作者介绍写为“在北京福冈日日新闻通信员末次政太郎”，并没有写成末次研究所的负责人或日本情报人员<sup>7</sup>。这就意味着，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并没有把末次看作谍报人员，而是把他看作一个日本媒体驻中国的通信员。同时末次研究所的地位在大使馆官员的心目中显然比不上一个日本地方报纸《福冈日日新闻》。

从以上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末次政太郎和末次研究所在日本政府中的地位并不高。同时从未次经常出现财政问题，想尽各种办法向日本政府申请和借贷经费的情况来看，在 1923 年以前，末次政太郎和末次研究所并没有受到日本政府的财政援助，应该是一个民间的研究所，而且可能只是由末次政太郎个人开办的小型民办研究机构，和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战略情报调查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虽然末次政太郎相关档案保存在日本外交史料馆的宣传类档案中，但是档案中却注着谍报者关系的字眼，这表示末次政太郎可能曾经有过谍报经历。综上所述，在到 1931 年为止，末次政太郎的谍报人员的身份并没有被证实，在 1931 年以后末次是否成为日本的谍报人员，末次研究所的性质是否转变为日本的谍报机构的问题还待考证。

本文参考使用的史料仅为日本现阶段公开的史料为依据，如果末次研究所确曾为日本的谍报机构，则可以想象可能还有许多资料未被公开。本文为现阶段资料所限，未能深入探讨。更深一步的探讨则期待在新资料被发掘以后。

另外，在日本外交史料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末次政太郎和北日本汽船会社社長末永一三，吴佩孚，溥仪等人相识，那么从这些历史人物入手，还有可能调查出末次政太郎的情况。报告人希望能把它作为今后的课题进行研究。

---

<sup>7</sup> 外交史料馆 A-3-6 “大每，东日/1 昭和 5 年 7 月 8 日至昭和 5 年 3 月 25 日”。